

马克思主义启蒙者李汉俊

□ 陈安杰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号汉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90年出生于荆楚大地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把李汉俊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评价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为信仰转学马克思主义

日本一度曾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受日本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还有李达、李汉俊等革命青年，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留学日本开始的。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先后求学于经纬学堂和晓星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留学生。留日期间，李汉俊深受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毅然放弃了较为喜欢的数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法、英4国语言，这对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带来了很大优势。矛盾曾回忆，如果李汉俊不转学马克思主义，“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选择了从事革命的人生道路，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根据日本档案馆解密档案，施存统正和行踪不明、被认为也是共产主义者的李汉俊一起，和日本社会主义者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目前对上述汉俊的行踪及已在进行暗中侦查的施存统的行动，正在严密注意、秘密侦查”。解密档案中提到的“汉俊”正是比施存统更早留学日本的李汉俊。据日本《外事警察报》报道，李汉俊还是“留日学生总会副会长，李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故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的亲弟弟”。从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档案资料记载情况来看，赴日的进步留学生大多都受到严密监视，尤其是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联系频繁的革命青年更是如此。

“非努力使中国赶快上社会主义的路上不可了”

1918年底，李汉俊毕业回国，从日本带回了大量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昼夜伏案翻译和写作，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回上海后不久，他就参加了《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充分利用了在《星期评论》工作的便利，又联络《新青年》《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建设》《小说月报刊》等报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晶等笔名，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文章与译文90余篇。单在《星期评论》上，李汉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达38篇之多，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阶级论，驳斥了张东荪等人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谬论。

1920年初，李汉俊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和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并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后，交由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同时，他还积极为党刊《共产党》月刊撰稿，担任《劳动界》周刊主编。参与创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团机关所在地的外国语学社担任法语教员。12月，他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希望武汉也尽早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回忆说：李汉俊“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内召开。他作为上海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学识和智慧保卫了党的一大会场的安全。党的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

1922年1月1日，李汉俊以“汉俊”的署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和《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自然非努力使中国赶快上社会主义的路上不可了。中国底同胞！努力吧！”

“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党的一大后不久，陈独秀返沪履行中央局书记职务，李汉俊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尤其是与张国焘发生了矛盾，是年年底卸去一切职务返鄂，就职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武汉后，他投入到火热的工人运动中。1923年，他与陈潭秋组织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部长。1924年，李汉俊脱党，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变，对共产党从事的伟大事业仍在默默支持。他曾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当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汉俊利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和省党部青年部部长的合法身份，将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300多名全部营救出狱。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军阀阎宗铨以“共产党首领”等罪名逮捕并于当晚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7岁。他用鲜血和生命向世人昭示，他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首批追任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上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是对李汉俊为中国革命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



革命意志坚如磐石

——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万晓庆

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革命老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南郊的茅家岭，是为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由碑身和基座两部分组成，碑身高28.5米，基座呈正方形，边长为20米。碑身正面刻有周恩来题写的“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9个鎏金大字，东面刻有刘少奇、朱德题词，南面和北面分别刻有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祭文。纪念碑底座正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大义，以重兵袭击我北移抗日途中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年三月，反动派将事变中所俘的新四军干部和从东南各省逮捕的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秘密囚禁在上饶市南郊的周田、茅家岭、石底、七峰岩、李村等地，建立起法西斯式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反动派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我革命同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妄图改变他们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斗争的崇高理想与信仰。我新四军干部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在党的秘密领导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多次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并于一九四二年夏，在集中营迁移福建前夕和迁移途中，成功地组织了茅家岭和赤石暴动，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出牢笼的同志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回到革命队伍，继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斗争。

在集中营的斗争中，不少同志在严刑拷打下，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让我们缅怀先烈的业绩，继承先烈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把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坚韧奋斗！
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这篇500多字的碑文，记述了上饶集中营建立的缘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志士的阴谋，讴歌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号召人们继承先

烈遗志，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奋斗。

皖南悲歌

1938年11月，日军在占领武汉后，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开始反共摩擦活动，频繁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反击。1940年秋，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歼灭进攻根据地的顽军11万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伺机报复。同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我党一面驳斥“皓电”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一面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机关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开始北撤，在行至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兵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干部战士除少数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用尽卑劣的手段掩盖真相，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在上饶建立法西斯式集中营，美其名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士兵大队”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别训练班”等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伎俩，我党进行了有力揭露。皖南事变后不久，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悲愤地揭露这一“千古奇冤”。

烈火淬金

国民党当局建立上饶集中营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动摇革命者的理想信念、磨灭他们的革命意志。为此，集中营的特务看守们绞尽脑汁，从肉体到精神对入狱者进行摧残折磨。上饶集中营由周田、茅家岭、石底、七峰岩、李村5座监狱组成，其刑罚集古今中外刑罚之大成，分为“金、木、水、火、土、风、站、吞、绞、毒”10种常刑，外加3种特刑和一种特别操，

不屈抗争

革命者在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的那一刻就把生命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在狱中，自由失去了，生的希望十分渺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成林

“耕者有其田”，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丰富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潜移默化，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针对农民群众理论、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我们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宣传策略，采取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注重运用标语、墙报、画报等多种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农民群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有效推动了农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汲取与吸收。如张贴的标语，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用来宣传共产党、红军性质、宗旨的；有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彭湃，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他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烧掉自家田契，深入农户宣讲党的政策，帮助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吸引农民，让农民感到亲近，他教农民记账、学珠算，把革命道理用当地方言编成歌谣、话剧，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通过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既使农民学到了实用知识，又使农民受到了革命思想教育，使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

灵魂引领，唤起农民的全面觉醒。党在农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促



茫。但是，这些都不能让革命者屈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的生命还要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得到升华。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中，狱中秘密组织了党支部，领导了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1942年夏，狱中党组织利用集中营迁往福建的时机，在迁移前和迁移途中成功组织了两次暴动，60多位难友冲出牢笼，重返革命队伍。

在上饶集中营，流传着许许多多革命者英勇不屈、智斗敌特的感人故事。新四军女战士施奇是机要科的译电员，在皖南事变前已被上级安排提前转移，但她主动要求留下经受考验，被俘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集中营“女生队”党支部书记李捷利用女生队被抽出去参加演出的时机，策划了两次越狱行动，自己却留下掩护同志，最后慷慨就义。据记载，上饶集中营先后有154人遇难，包括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等新四军将领都长眠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建立新中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目标。

想农民之所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一直是我们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实践时，我们党宣传土地革命思想，动员农民“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一切公共地”等以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设置了以乡为最小分配单位的要求，逐步探索制定出了旨在满足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

早在井冈山土地革命开展之前，我们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间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毛泽东通过对宁冈的坝上、永新的秋溪一带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初步制定出土地政策后，我们党一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在革命实践中探寻政策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一边继续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工作来引导农民，提高他们对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认识，推进政策的广泛有效落实。我们党通过领导农民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实现了

进了农民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与接受，成功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帮助农民改变了自身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有效地推动了农民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政治素质方面，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农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掌握的理论应用于农民运动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使农民从宗法观念的迷醉中觉醒，使之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勇敢地向传统宣战，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宣战，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思想素质方面，我们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逐渐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走出蒙昧无知，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即如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有些地方，如在福建、安徽等地，一场农民运动，往往能够吸引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文化素质方面，基于这一时期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也基于农民日常生活实际，我们党创办了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工农文化教育组织，把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识字做起，逐步提高，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力，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